

巴里坤山神庙碑与康熙年间的京城崇道之风*

梁燕[◎]

内容提要: 文章结合档案与史籍记载,对现存于今新疆巴里坤县城南岳公台山麓的山神庙碑进行了研究与分析。研究发现,巴里坤山神庙,实际上是靖逆将军富宁安在钦差道士李庆安的密嘱下,于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开工建造,次年八月完工,并勒碑纪念。山神庙碑的碑文,除简述建庙缘由及其修建者外,也真实反映了当时新疆巴里坤出现的暖冬气候。巴里坤山神庙,作为清代新疆第一座官修道教庙宇,不仅是康熙年间京城崇信道教的社会风气在西北边陲的反映,也是清朝在平准战争运用军事巫术的一个生动案例。

关键词: 巴里坤 山神庙 康熙帝 道教 军事巫术

作者简介: 梁燕,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新疆警察学院副教授。

巴里坤山神庙碑,又称富宁安碑,位于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城南约2.5公里的巴里坤山(岳公台)北麓,刻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反映了康熙末年清朝为平定策妄阿拉布坦之乱派兵驻守巴里坤的一段史事。^①此碑自发现以来,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②但囿于资料限制,一直以来,已有成果多止于描述性或概括性研究,相应缺乏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缘此,笔者拟结合档案文献资料,试对巴里坤山神庙碑及其所反映新疆宗教文化史意义进行研究与分析,以揭示清朝统一前的新疆社会历史风貌。

一、巴里坤山神庙修建的政治背景与建造者

因长期的自然侵蚀和缺乏有效保护,现存的巴里坤山神庙碑字迹模糊,较难辨认。庆幸的是,其内容较为完整地收录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编成的《镇西厅乡土志》一书中。为便于后文讨论,将其移录如下:

山神庙记

靖逆将军吏部尚书兼管总督仓场事务富公宁安,恭奉圣天子命,讨贼寇妄布坦侵犯哈密之罪,驻兵巴尔库尔,秣马励兵,蓄锐以待进取。维时天地之气,清和成理,水草丰美,材木贍用,商贾辐辏,士马饱腾。荒塞互寒之区,气候顿易,四时风景,宛若春台化日。是皆圣天子仁德广被,百神为之效灵也。因于山麓,茸庙崇祀,用答神庥。塞外诸夷瞻斯庙也,当必共慄然于天威之无远弗届矣。庙侧有天然石一片,谨勒以志之。

领兵诸公,开列于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暴力恐怖犯罪群体犯罪心理生成与防范机制研究”(编号:17CSH041)阶段性成果。

① 编写组:《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不可移动的文物·哈密地区卷(3)》,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第377—378页。

② 王炳华主编:《新疆历史文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177页;黄达远:《清代镇西“庙宇冠全疆”的社会史考察》,《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戴良佐:《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5页;刘小萌:《考察报告:新疆的清代遗迹——以八旗驻防为中心》,参见赵志强主编:《满学论丛》第3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176页;王鹏辉:《清代民初新疆镇迪道的佛寺道观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3—54页。

钦命靖逆将军吏部尚书兼管总督仓场事务富宁安
议政大臣散秩大臣世袭头等精奇尼哈哈番阿尔纳
统领京兵副都统世袭三等阿达哈哈番兼佐领事英桂
统领左翼察哈尔官兵副都统世袭二等精奇尼哈哈番法脑
统领右翼察哈尔官兵副都统世袭二等阿达哈哈番智永
西安左翼(缺)
肃州总兵官右都督世袭二等阿达哈哈番杨长奉
康熙五十八年己丑仲秋吉旦 通商道副使王全臣记 督工潼关副将潘自善^①

据碑文首句所言：“靖逆将军吏部尚书兼管总督仓场事务富宁安，恭奉圣天子命，讨贼寇妄布坦侵犯哈密之罪，驻兵巴尔库尔，秣马励兵，蓄锐以待进取。”这便点明了巴里坤山神庙修建的政治背景，即因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袭击哈密，富宁安奉旨率兵屯驻巴里坤。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准噶尔蒙古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兵突袭哈密，康熙帝随即调派兵力前往抵御，并派吏部尚书富宁安负责统一指挥。八月，富宁安与西安将军席柱率头队官兵抵达驻地巴里坤。为加强防卫，在先期抵达的肃州总兵路振声所设哨卡之外，又添设哨卡，接连立营，并在各队全部到齐后，又自巴里坤东边之奎苏^②遍立营盘。^③据同年十月至巴里坤运送军粮的陕西周至县知县张寅所见，巴里坤大营分为三部分，东为席柱率满兵所驻将营，西去五十里为路振声领兵所居总营，又西去二十里为甘肃提督师懿德领兵所居提营，“其余星罗棋布，灯火绵延数十里”。^④此后，随着清朝在巴里坤的持续经营，巴里坤成为西路清军的大本营。

在战争经济的刺激下，巴里坤地方商贸兴盛。据富宁安报告：“今自边内来贸易者，较前益加多，商街扩展，商人又增建房屋。从肃州至巴里坤商贾不绝，沿途如同内地，均设商摊。商贾将绸、布、茶及衣服、靴、袜、针、线等各类小物，俱携至巴里坤出售。此俱蒙古人所需物品，喀尔喀地方之蒙古，驱赶牛羊，可互换出售，诸物均价廉”，为维持街市秩序，富宁安又派八旗与绿营官兵“均于商街坐堆子，不时巡察”。^⑤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巴里坤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嘉峪关至巴里坤，每站皆有住店、商铺，沿途往返商人，毫无劳苦之处，由边内来贸易者，较先益加增多，市场房屋又拓展增建。商人所携诸项物品甚多。喀尔喀地方之蒙古人，陆续驱赶牛羊亦多，相互交换转售，诸项物品、牛羊价格，较先更贱，于军士大有裨益”。^⑥在清朝的大力经营下，康熙末年的巴里坤由起初的边界设哨之地发展成为西北军事重镇。

又据碑文末尾所记，当时领兵诸将为：富宁安、阿尔纳、英桂、法脑、智永、杨长奉，

① (清)阎绪昌、高耀南等：《镇西厅乡土志》，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61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389—390页；另见马大正等整理《新疆乡土志稿》，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

② 奎苏，在宜禾县治东九十里。当巴尔库勒淖尔发源地，左、右两流之间。今新疆巴里坤县奎苏乡。参阅钟兴麒等《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265，康熙五十四年九月辛酉。

④ (清)张寅：《西征纪略》，参见吴丰培整理《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全二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第62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335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奏报肃州等处训练并贸易情形折》(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81页。

碑文撰写者为通商道副使王全臣，督工建造者为潼关副将潘自善。但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除富宁安与阿尔纳外，其余诸人的名字或官职多有讹误之处。如英桂，实为时任军前副都统的觉罗英柱。^① 法脑，实为时任前锋统领副都统的法璫。^② 智永，《清实录》记作智勇。^③ 杨长奉，实为时任西安左翼汉军副都统肃州总兵的杨长泰；潘自善，实为固原提督潘育龙侄孙潘之善，因在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袭击哈密时守城有功，升任潼关副将。^④ 通商道副使王全臣，实为当时在巴里坤军营办理军需粮饷事务的陕西潼商道道员王全臣。^⑤ 王全臣，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科进士，历任河南汲县知县、甘肃河州知府、宁夏府水利同知、平凉知府、陕西潼商道等职。任职期间，广开渠亩，兴利除弊，颇有政声。^⑥ 王全臣在任职地方多有文词碑刻流传，从《山神庙记》一文，我们亦可读出其进士文才。

二、钦差道士李庆安与巴里坤山神庙的修建原委

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康熙帝秘密派遣道士李庆安至巴里坤军营，用道教神法操练军兵，以剿灭策妄拉布坦。康熙帝在行前专门指示李庆安：“尔前往同富宁安商议，可行则行，倘有不可，即悄悄停止返回”；并密令富宁安试验可用则用之。^⑦ 为了试验或是自证其能力，道士李庆安于十月十八日抵达巴里坤后，先是于二十三日，携活羊一只，做法事祭祀巴里坤南山，“祭毕，山内自日出方向向日落方向，山作回声，全体官兵俱闻之”，因当日富宁安没有听清而未奏报。至十一月二十日，李庆安再次做法事祭祀南山，富宁安与在场官兵俱听得山内自东向西又作回声，纷纷言称：“由每祭山谷如此回响观之，当属特异之人，况且我皇上甚神圣英明，诸事无所不晓。果非特殊异学者，无益于汛地，能派遣乎？”^⑧ 由此，道士李庆安确立了在巴里坤军营的神异地位。

在此期间，李庆安看中了军营内的一座小土山，并向富宁安言称：“此山甚好，为风水之地，建庙则善。北建御銮殿一座，供献关帝神；中建白极殿一座，以祭真武神；两帝建配殿、碑亭，周围做木栅结营；南立大门及牌楼。于军中甚好，我仍有前来叩请之项，操练之事亦好。勿告我言，作为将军之意，告众修建为好”；富宁安随即以己之意向众官兵言之，“大臣、官员、军士俱喜悦，各自分地，取木集匠”，开工建造。^⑨ 结合前文所揭《山神庙记》内容来看，李庆安密嘱富宁安所建庙宇，应即是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完工的巴里坤山神庙；营内小土山，应即是今日巴里坤县城南之岳公台；庙内碑亭所立石碑，应即是留存至今的巴里坤山神庙碑（富宁安碑）。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8，康熙五十九年冬十月癸亥。

② 《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癸未。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0页；《副都统法璫奏为授前锋统领谢恩折》（康熙五十六年六月初二日）。

③ 《清圣祖实录》卷259、298，康熙五十三年五月乙酉、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壬子。

④ 《清国史》（嘉业堂钞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6册，第31—32、195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283、298，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乙卯、康熙六十一年七月戊子。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0册，第591页；《署陕西总督刘于义奏请将原任潼商道王全臣题授安西兵备道折》（雍正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38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奏闻道士欲以神法训练军士折（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42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密奏道士祭神显灵情形折》（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42页。

此外,据富宁安先后奏报,康熙五十七年秋冬季节至康熙五十八年春季之间,巴里坤出现了暖冬气候,温暖适宜,并不寒冷。如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奏称:“今年秋季,雨水合时,到处水草茂盛,官兵之马畜俱益加肥壮。入冬以来,五次落雪,雪厚不过二三寸。因气候较暖,雪落即融,如今并不冷。”^①十一月初,庙宇开建时,刮起了小风,稍显寒冷,但自初八日起,气候变暖,风亦止。至二十二日,甚暖,旷野之雪大半融化,大山之雪亦俱融化,黑土俱亦显露。比去年甚暖,并不寒冷,富宁安为此感到惊奇。^②至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富宁安再次报告:“巴里坤地方,如同内地,四季适宜。今年春季,已降二三次小雪,天气较暖,即刻融化。二月末,各地青草均吐出,羊俱得以食饱,今已上膘。三月又二次降雨,十日左右,青草连长三四寸不等,马畜俱得以食足。现官兵之马畜皆上膘。”“巴里坤地方,虽系蒙古旷野,仰赖圣主鸿福天佑,雨水四时调匀,冬季无严寒,夏季无炎热,地方水佳宜人。故满蒙、绿营官兵、跟役以至商人,脸色俱甚佳,并无病灾,仰赖圣主之恩,太平欢乐而生”。^③结合《山神庙记》所言“维时天地之气,清和咸理,水草丰美,材木贍用,商贾辐辏,士马饱腾。荒塞互寒之区,气候顿易,四时风景,宛若春台化日。是皆圣天子仁德广被,百神为之效灵也”等语,两者正可相互印证,即巴里坤在康熙五十七秋冬季节至次年春季间出现了暖冬气候。

钦差道士李庆安来到巴里坤军营后,便向富宁安提出在满洲、绿营兵内,“酌选年轻者八百名,另外设营,我以六丁六甲神法进行操练,以此制红布褂穿服之,外各穿盔甲,不用鸟枪,俱佩带撒袋,用红纛旗,策妄喇布坦所驻西方金地,用赤者,前面用赤红火毁金,令八百名兵丁,四面四角各一百名,设头目督管,占据各自处操练。此练习于明年三月初始,进攻时我为道士装扮”。^④其后,李庆安进一步表示:“来年三月二十日左右,我率领我操练之八百兵丁,先往取吐鲁番,大军不必与我同启程,留后六七日,再从容启程前往。我获吐鲁番,来报将军后,将军率兵往吐鲁番,抵达后,将军率兵留驻吐鲁番,我仍亲率所操练之八百兵丁,直寻策妄喇布坦驻地,剿灭策妄喇布坦,如此功可速成”;当富宁安对此提出疑问时,李庆安则解释称:“我并无交战,赖行神法。诚无神法,八百兵丁何足?马瘦亦无碍,我务施神法,能至极处置。沿途若遇贼,我施天魂招神法,念咒则自然不可行动。以此我既然招服沿途其属下之众俱降,策妄喇布坦逃往何处?伊若归降,我即收容;伊若不降,我即可剿杀。”^⑤所谓六丁六甲神法,乃是道教方术中常用的军事巫术。六丁神为丁卯、丁巳、丁未、丁酉、丁亥、丁丑,六甲神为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源于我国先秦时期的战争巫术,在道教信仰体系中常将其作为武神,被道士召请,用于降妖除魔、禳灾驱鬼的法事活动。明代真武大帝信仰兴起后,六丁六甲神成为真武大帝的常用神将。因而,在道教宫观中,六丁六甲神常被置于真武大帝两旁,作为护法神。如在供奉真武大帝的故宫钦安殿内,东西两侧的墙壁上即绘有十二天将。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道士李庆安密嘱富宁安所建山神庙中殿,何以供奉的是真武大帝。而关帝神,则是满汉军民共同尊奉的军神。李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35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奏报肃州等处训练并贸易情形折》(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42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81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奏报气候及兵民生计情形折》(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38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44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奏为道士称以神法进兵折》(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庆安用六丁六甲神法操练军兵的设想，直至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方获准实施。^①综合来看，道士李庆安在巴里坤大营运用道教方术练兵的计划应未及实施，但巴里坤山神庙作为其道场，则于当年八月竣工。

关于道士李庆安的来历，因缺乏相关资料，尚难知晓，但从其与康熙帝的密切关系来看，应系在内廷行走之道士，并颇得康熙帝赏识。李庆安来巴里坤时，康熙帝不仅赐给宝刀、坐垫等物，还赐给图记、封套以便呈递奏折使用。^②李庆安自己亦表示：“我乃出家修道之人，年甚幼，如此军务大事，本不应前来。惟遇圣主以来，仁养我之殊恩，实已至极，我上恐悖皇上仁爱之恩，下恐辱父母养育之身，故日夜惶悚。今既来汛地，欲报效皇上殊恩。”^③但从康熙帝在其奏折中所做批语“尔所奏之事，字词均不符，重复亦多，朕难于批示”^④，以及其自言“我因未学文，不能缮写奏事陈此等情由，故请将军代我具奏”^⑤等情况来看，李庆安的知识文化水平似较为稀松平常。

值得指出的是，自康熙五十四年清军驻守巴里坤后，巴里坤不仅成为清朝经略西北的前哨基地，也是清朝与准噶尔蒙古等民族交通往来的关键中转站。因而，巴里坤山神庙不仅是当地驻军和商民的精神依托，也应是准噶尔蒙古等使者或商队共同瞻仰的文化地标。期间清军虽两度撤守巴里坤，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巴里坤山神庙至少在清朝统一新疆后的乾隆三十七年间依然存在。^⑥巴里坤山神庙作为清代新疆第一座官修庙宇，自此开启了“镇西庙宇冠全疆”的社会史生成历程。

三、康熙年间的京城崇道之风与军事巫术

在巴里坤军营祭山修庙并运用道教法术参与战争的道士李庆安，看似荒谬，但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与社会文化中，并非特例，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宗教文化意涵。

清朝前期，满洲皇室虽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并不再像明代帝王那样推崇道教，但并非是完全冷落，而是加以限制和利用，乃至宠信个别道士，来营造相应的社会舆论氛围，以维护和巩固自身统治。^⑦对此，康熙帝晚年曾表示：“朕六十年来，闻佛、道二门，千方百计，将三教九流书中可以相似者，拟不过数句，借为口实。若问全篇，则不贯串者，十中八九。还有非常、怪异、避谷、纳气、二便、嗜水、采战、铅汞、炼丹、内丹之类，亲身目睹者，不计其数，那肯轻信一言。朕以忠厚待人，凡有此者，必令罄其所会，可者试看，不可者也就罢了，总未追其根源。前者谢万成、王家营炼丹者，皆是此道待之，非有信也”。^⑧正是由于康熙帝宽容相待的态度，在其周围有众多的道士出入内廷，以供驱策。除身份不明的谢万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66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奏为道士李庆安称另立营操练折》（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39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39、1367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密奏道士请赏敕书折》（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吏部尚书富宁安密奏速送道士李庆安奏折折》（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72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40页。

⑥（清）佚名：《新疆地輿总图》巴里坤图，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相关研究见王耀《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新疆地輿总图〉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3期。

⑦ 杨启樵：《明清皇室与方术》，上海书店2010年，第143—163页；佟洵主编：《北京道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00页。

⑧ 《清圣祖谕旨二》，参见故宫博物院：《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第55—57页。

成、王家营等炼丹者外，在康熙帝早年有备受推崇的全真教龙门派中兴之祖王常月，晚年则有李不器、王文卿等人。陕西籍全真道士李不器，受步军统领隆科多举荐，出入内廷，素受康熙帝格外隆恩。但在康熙帝去世后，因未赴部举哀，被新君雍正帝遣回原籍，严加看守。^①保定府道士王文卿，人皆称其王神仙。^②而被秘密派往巴里坤军营的李庆安，亦应属于深受康熙帝宠信的道士之一。此外，康熙帝还指派大臣及亲随和太监等，向道士学道或占卜推命。在现存档案中，不仅有康熙帝晚年请人为皇孙弘历所做的八字推命书，还有康熙帝命年羹尧入京找罗瞎子推算以及命范弘偲与太监李兴泰、冯尧仁等跟随王真人（王楨）参道入定的活动记录。^③而太监李兴泰则担任了宫中钦安殿的道长。^④

除康熙帝周围的道士外，还有众多道士游走于宗室公卿之间。如二眉道人朱方旦，以术游走于公卿之间，并多奇中，“一时礼之为师者，自王而下，朝贵至数十人”。^⑤另有一些宗室贵族则信奉道教，并沉迷其中。如曾任平逆将军的贝勒延信，平素沉迷道教，担任西安将军期间，不仅常去甘州东山寺与道长讲道，府内亦常有道士出入其间。^⑥镇国公景熙则素与平白姑子、刘瞎子等人往来，并于康熙五十六年用镇魔之术欲谋害康亲王，却反将自己咒死，以致康熙帝都表示：“景熙品行，素甚可畏，朕皆曾惧之也。”^⑦此外，还有一些道士，则不自觉地卷入了康熙末年皇储纷争的政治漩涡，为夺嫡诸子提供“天命所归”的心理暗示和社会舆论。如为皇八子贝勒允禩相面的张明德以及为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允禩算命的张瞎子等人。相面人张明德最初由顺承郡王布穆巴的王府长史阿禄，引荐给顺承郡王及镇国公普奇、辅国公赖士等人，并住于普奇家中；后又由顺承郡王引荐给了皇长子直郡王允禔，并由普奇引荐给了皇八子贝勒允禩，并在皇太子允礽被废后为允禩相面，称其“后必大贵”。^⑧张瞎子，原名张恺，陕西临洮府人，以会算命闻名。康熙五十八年，知府王景灏为讨好抚远大将军允禩，而将其带到西宁为允禩推算八字，并称其“有九五之尊的运气”。^⑨身在潜邸的皇四子胤禛也并非稳如泰山，不信方术。康熙五十五年，亲信戴铎向其报告，途经武夷山时，遇见一位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遂向其卜问，道人则称其主子“乃是一个万字”；雍正则批云：“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⑩以上种种，可谓是康熙年间京城崇信道家方术之风的不同侧面，也是李庆安能够深受宠信并被派往巴里坤的社会原因。

道士与道教方术除参与宫廷政治外，还被作为军事巫术运用到清朝统一边疆的战争中。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朝汉文谕旨汇编》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9册，第12页；《四川巡抚宪德奏覆荐保定府道士王文卿缘由折》（雍正八年八月初六日）。

③ 《乾隆八字》，参见故宫博物院《掌故丛编》，第1—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813、1085、1086页；《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在京未见罗瞎子折》（康熙六十年六月初九日）、《范弘偲遵旨诣王真人处求道情形折》、《范弘偲奏报危坐参道经过情形折》。

④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859—860页。

⑤ （清）王应奎撰，王彬、严英俊点校：《柳南随笔续笔》，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

⑥ 《雍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2册，第59页；《陕西巡抚西琳奏报质审延信署内民人道士情形折》（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⑦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611页；《步军统领隆科多奏报打听景禧公掩埋法书事折（附：上谕一纸）》；《清圣祖实录》卷274，康熙五十六年九月癸酉。

⑧ 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戊戌、壬寅。

⑨ 《雍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册，第669页；《川陕总督岳钟琪奏遵旨前往拿获张瞎子并密查凉州蒙古窃盗拒捕折》（雍正四年正月初四日）；《清世宗实录》卷45，雍正四年六月甲子；杨启樵：《明清皇室与方伎》，第154页。

⑩ 《戴铎奏折》，参见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第三辑，故宫博物院1935年，第三叶。

如二眉道人朱方旦，率兵讨伐吴三桂叛军的大将军勒尔锦与时任湖广巡抚的张朝珍等，皆将其奉为上宾，赠予匾额，乃至让其参与军机要务。^①康熙五十九年四月，驱准保藏大战在即，康熙帝则给坐镇西宁指挥的大将军胤禛（允禵）送来了“妙药十二斤八两、神符一万张、寻生救苦丹一千丸、保心石二万一千五百小丸及装匣之六丸药、药方、药引子”，以备使用，并寄谕称：“此处李道士之符，于百病颇有裨益，故令制作万张，写明适宜引子送去。再李道士言：凡有法之人，若有兴云作雾之项，用生过女儿之高堂嫂，则无对手。又言：行军之地，如不得之，以陈醋涂于箭矢而射，则无所不催。此虽皆小事，然行军之人不可不知。又禀称，军中如有瘟疫等，熏死人脑骨则好。”^②神符与药引子、生过女儿的高堂嫂、陈醋涂箭、熏死人脑骨等做法，皆系道教厌胜驱邪之法术，与李庆安在巴里坤军营用六丁六甲神法操练军士如出一辙。至于此处之李道士究竟是李不器还是李庆安，亦或另有他人，则无从得知。而所谓兴云作雾、散播瘟疫，即是蒙古萨满巫师与藏传佛教红教喇嘛常用的战争巫术。

无独有偶，在此后的清朝平准战争以及其他战事中，亦多有运用军事巫术的事例。如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之战中，雍正帝即曾给前线将领各颁宝石一块佩带，以鼓励之。^③雍正七年（17129）五月，清朝平准大军出征在即，雍正帝颁给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神符一道、黄宝石一块，并在其谢恩折里批云：“卿佩此物，如我君臣协行天地，神明如有慈佑朕意者，必及卿也。净念一诚，对天书谕”；黄宝石为宫内旧物，康熙帝曾称此宝行阵之间佩带者有利益，并在平定噶尔丹之乱时赐予皇长子允禔佩带；神符则系雍正帝在二十余年前亲自向章嘉活佛所求，活佛表示“此符之利益，不可胜数，系保冲锋破敌之宝箴”。^④至雍正十年，岳钟琪被免去大将军职务后，神符和宝石被收回并分赐给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与副将军张广泗，查郎阿则表示：“从此行军进止，如有神助，仰仗天威，廓清西域，永靖外藩，军务成全，悉由恩赐。”^⑤在此期间，雍正帝又于雍正九年十月派遣侍卫丁云龙来到巴里坤军营，交给岳钟琪试看。^⑥两个月后，经岳钟琪试看，丁云龙不仅长于火攻、会造火箭、刀法颇好，而且略通医术，“兵丁有患膀臂腰腿疼痛者，经伊疗治，俱向患处默念词语，或用手按拍痛处，或以口吹气。所治之人内，亦有竟未见效者，亦有效验痊好者”；岳钟琪本人则因患感冒而脾气失调，饮食减少，丁云龙便为其画朱符服下，并传授其运动功；岳钟琪依法运动后，“觉筋络舒畅，脾气复原，饮食如旧”；但丁云龙言语之中“殊有荒谬之处”，回京后又向军机大臣等夸大其功。^⑦从侍卫丁云龙的表演来看，虽不能确定其是否为道士，但至少是一位通晓道教方术之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金川前线果州一带山沟连日雨雪，乾隆帝则认为此种反常的天气现象必系番人扎答巫术所致，“其法在番地山中用之颇效，然亦可用扎答阻回”，遂即派遣善用扎答巫术的三济扎布、萨哈勒索丕二人，驰驿前往军营备用；同时指示前线清军将领温

① 《清圣祖实录》卷 101，康熙二十一年二月癸未。

②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54、1658 页：《抚远大将军胤禛奏谢赏药折》（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康熙帝朱谕一纸》。

③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31 册，第 757 页：《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恩赏荷包宝石等物赐给岳钟琪等进勳得力官员折》。

④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5 册，第 370 页：《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谢钦赐出口顶佩宝石宝符并缴朱谕摺》（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⑤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3 册，第 753 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谢恩赐原赏岳钟琪之神符黄宝石折（残）》（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⑥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1 册，第 438 页：《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覆遵旨留心试看丁云龙折》（雍正 9 年 11 月 7 日）。

⑦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1 册，第 653 页：《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覆试看丁云龙的确实技艺并遵旨令其起程回京折》（雍正十年正月十日）；同书第 22 册，第 38 页：《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覆侍卫丁云龙在军营行医实情折》（雍正十年三月十九日）。

福等人，“该处番人及红教喇嘛内，多有习其术者”，“留心访觅精通扎答之人，随营听用”。^①其后不久，再次谕示温福等人称：“此等邪术，不过欲使人怖畏。人若见而生怯，则其术愈逞。惟能处以镇定，视之淡然，其技穷而法亦不灵。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温福、阿桂，当晓谕营中将士等，令其共知此意。”^②不难看出，在战争中运用巫术以助取胜，以致稳定军心、提振士气，并非是康熙帝亦或道士李庆安所独有，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古代理想战争形式。

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萨满教战争哲学中，其基本观念之一，就是认为苍天具有无上威灵，只有天神及战神助威才能够战胜敌人，而统治者则代表天神和战神惩恶扬善。^③这与儒家文化所强调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对崛起于东北并信奉萨满教的清朝皇室而言，则是再熟悉不过之事。因而，在清朝所独有的皇家祭典堂子祭中，即有为出征和凯旋而专门举行的萨满祭祀活动，“实国家祈祷之虔，百神之所佑庇，与商周之制，若合符节，所以绵亿万载之基也”。^④乾隆帝亦曾一语道破：“国家德被遐方，威宣绝漠，不惟师武臣力，亦实有神灵之助，用能厚集士众，克成大勋。”^⑤因而，无论是道教法术还是其他宗教的巫术，都只不过是统治者在战争中“厚集士众、克成大勋”的工具和手段，进而彰显战争的正义性（师出有名）以及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天命所归）。这也正是巴里坤山神庙修建的最终目的，即“塞外诸夷瞻斯庙也，当必共懍然于天威之无远弗届矣”。

四、结语

通过对巴里坤山神庙碑的研究与分析，不仅理清了巴里坤山神庙修建的始末原委，也使我们对康熙年间朝野上下崇信道教方术之风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对道教法术作为军事巫术在清朝平准战争中的运用以及清代新疆道教传播史都有了新的了解。巴里坤山神庙，作为清代新疆第一座官修庙宇，不仅浓缩着中原内地对西北边陲的深刻影响，更昭示着清代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一体化进程早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即已悄然展开。

（责任编辑 王皓月）

① 《清高宗实录》卷 907，乾隆三十七年四月甲午。

② 《清高宗实录》卷 909，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丙辰。

③ 色音：《萨满巫术与北方少数民族军事谋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④ （清）昭梿撰，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231页。

⑤ 钟兴麒等：《西域图志校注》，第166页。